

从两周金文看周人对误书的处理*

谢 明 文

内容摘要:周代金文中常见误书现象,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即误书后书写者已经及时发现了的。通过对两周金文中这类误书现象的整理,可知周人铸造铭文过程中应对误书时的处理方式有使用修改符号,忽略误书、重新书写,将就误书、加以改造三种情形。梳理误书现象与处理方式,对理解一些金文异形字的构造和正确隶定以及准确释读金文文献都有帮助。



关键词:金文 误书 糅合

误书,是指错误的书写(包括铸、刻、毛笔写等方式),既包括字形的误书,也包括语序的误书。从周代金文资料看,误书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且有的误书应该是书写者(包括校订铭文模的人)在当时已经发现了的。错而能改,相对于其他载体,青铜器上的误书,修正起来更不容易。本文通过对两周金文中这类误书的整理,略窥周人铸造铭文过程中及时处理误书的方式。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使用修改符号


“十又一月”,郑虢仲簋(《集成》04025、《铭图》04996,西周晚期)盖






铭、器铭分别作“”“”,郑虢仲簋(《集成》04024、《铭图》04995,西周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商周甲骨文、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1BYY133)阶段性研究成果。

期)盖铭作“”,系正常语序。郑虢仲簋(《集成》04024、《铭图》04995,西



周晚期)器铭作“”,郑虢仲簋(《集成》04026、《铭图》04997,西周晚期)

作“”,它们的“又”下多一曲笔且其上有“一”字。研究者认为“又”下多出的这一曲笔是钩识、是钩倒符号,标明此字应与上面一字调位,即古文所谓“乙正”^①。按照“又”下多出的这一曲笔是钩识符号的意见,说明西周已有表示“乙正”的修改符号。具体到郑虢仲簋(《集成》04024、《铭图》04995)器铭以及郑虢仲簋(《集成》04026、《铭图》04997)铭文,说明书写者将“十又一”误书作“十一又”,发现了书写顺序的错误后用“乙正”的修改符号加以更正。

筭匜(《集成》10251、《铭图》14936,西周晚期)“唯筭肇其作沫其它(匜)万年无疆”,“其它(匜)”作“”,“其”与“它(匜)”右侧有“”形符号,研究者认为这也是钩倒符号,表示“其匜”当作“匜其”^②。也就是说,铭文当作“唯筭肇其作沫它(匜),其万年无疆”。从辞例看,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二、忽略误书,重新书写

亚戛侯矣爵(《陕集成》1762、《铭图》08358,商代晚期)铭文作

“”^③,一般释作“亚戛(戛)戾(侯)矣(疑)”,可从。但“戛”作“”,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张振林:《商周铜器铭文之校雠》,《训诂论丛》第3辑,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778页。陈英杰:《谈两周金文中的讹字问题》,赵平安主编:《讹字研究论集》,中西书局,2019年,第110页。

②孙稚维:《金文释读中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56—58页。吴良宝:《漫谈先秦时期的标点符号》,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③《铭图》08358(第16卷第449页)所著录的铭文拓本经过水平翻转。此处依《陕集成》1762字形。

中间较正常写法的“𡗗”多出了“厂”形,应是涉下文“𡗗(侯)”字所从“厂”形的影响而误。即书写者在书写完“己”形后受其下“𡗗(侯)”字影响误书了“厂”形,发现错误后忽略误书的“厂”形,再重新书写“𡗗”下部所从的“甘(其)”形。

楚大师邓骅慎钟(《铭图》15516,春秋早期)“庶”与作“𡗗”类写法的“𡗗(侯)”之间有“𡗗(𡗗)”字。周亚认为是“侯”字衍文^①;吴镇烽将“庶”之后的两字释读作“𡗗(侯)𡗗”,认为“庶𡗗”下一“𡗗”字系衍文^②;暨慧琳将“庶”与其后的两字径释作“诸𡗗𡗗”,认为“用乐诸𡗗𡗗”句涉前字衍一“𡗗”^③。“𡗗”与同铭以及同人所作其他基本同铭的钟、镈(楚大师邓骅慎钟,《铭图》15511—15514,春秋早期;楚太师邓子骅慎镈,《铭续》1045,春秋早期)铭文中的“𡗗(侯)”字写法明显有别,与《合集》27032+《合集》27739(李爱辉缀)^④“𡗗”无关,“𡗗”和“𡗗”是同形字关系,应该是书写者在书写“𡗗(侯)”字已完成了“𡗗”形部分准备在中间竖笔上添加圆点饰笔或横画饰笔之际受其前“庶”字下部“火”形的影响,误加了两小点。发现错误后,舍弃了这个错误的字形,忽略误书,再重新书写正确的“𡗗(侯)”字^⑤。

闕卣(《集成》05322、《铭图》13213,西周早期)铭文作“闕作生(皇)号日辛尊彝”。“日辛”原作“𡗗”,“日”前之字原作“𡗗”,与“易”下端未添加饰笔前的初形“号”形体相同。据文例,“号”所表之词宜是“考”,但“考”与“号/易”读音远隔。金国泰指出该字是“𡗗”字涉下文“日”字而

①周亚:《楚大师登编钟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1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②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


③暨慧琳:《先秦两汉典籍类出土文献特殊文例整理与研究——结合〈古书疑义举例〉看出出土文献中的相关问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刘钊指导),2021年,第107页。



④李爱辉:《史语所藏甲骨缀合六则》,《中国文字》新39期,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72页。






⑤笔者曾提出过这一判断(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注6),兹补充说明得出这一判断的证据。

类化增日^①。根据上文所论金文中忽略误书、重新书写的现象,此“号”可能是涉其下“日辛”的“日”字影响而误。即书写者在书写完“圭”形后涉下文“日”字影响误书了“日”形而漏书了“丂”,发现错误后忽略误书的“日”形,再重新书写用作“考”的“丂”。

三、将就误书,加以改造

山仲簋(《铭图》04186,西周早期)“山中(仲)乍(作)宝”后的“”形,旧一般径释作“殷(簋)”。它较一般的“殷”多出了左上方的“口”形,且“殳”形较左下“簋”字初文“𠂔”的位置要靠上很多。这应该是书写者涉其上“宝”字所从“口”形的影响先误书了“口”形,然后又写了“殳”形,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在左下书写“𠂔”形构成“殷”^②。

狱簋(《铭图》05316、《铭图》05318、《铭续》0458、《铭三》0520,西周中期)“王各于康太室”之“各”皆作标准的写法。同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狱盨(《铭图》05676,西周中期)铭文中,盖、器中的异文分别作“”和“”,与一般的“各”写法有别,其中“夂”形中那一长弧笔明显是断开的。狱盨铭文中此处与狱簋“各”相当的异文应分析为“令”与“各”两部分,且两者共用部分笔画,可隶定作“𠂔”。这一字形应该是作铭者先误书“令”字,发现错误后,将这个错误字形,借用其部分笔画,重作正确的“各”字。

“侖生”之“生”,格伯簋(《集成》04264、《铭图》05307,西周中期)作“”“”,格伯簋(《集成》04263、《铭图》05309,西周中期)作“”,格伯簋(《集成》04265、《铭图》05310,西周中期)作“”,格伯簋(《集成》04262、《铭图》05308,西周中期)器铭作“”,这些都是标准的“生”字写法:竖笔中间或加圆点饰笔,或圆点饰笔演变为一横笔(现在“生”字中间

^①金国泰:《〈金文编〉读校琐记》,《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103页。

^②这是根据“殳”形较左下“簋”字初文“𠂔”的位置要靠上很多,从而判断其书写可能早于“𠂔”。如果“殳”形书写晚于“𠂔”,那此例可归入“忽略误书,重新书写”类。即书写者涉其上“宝”字影响误书了“口”形,发现错误后忽略误书的“口”形,再另行书写“殷”字。

的一横就是由圆点饰笔演变而来的)。与上引“𠂔生”之“生”相应之字,格伯簋(《集成》04262、《铭图》05308,西周中期)盖铭中作“𠂔”,与上引他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簋铭中的“生”字以及周代金文系统中的其他“生”字写法明显有别,即其上部较一般的“生”字多出一部分笔画。其实它应是受紧邻其后的“𠂔(𠂔)”字影响,先误作“𠂔”字,书写者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改成“生”字。

1975年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一号窖藏出土了八件此簋,除了此簋(《陕集成》0067,西周晚期),其他七件此簋铭文中用作排行“叔”的“𠂔”皆作正常写法“𠂔”,但此簋(《陕集成》0067)相应处的异文,盖铭作“𠂔”,器铭作“𠂔”,上部皆从“又”,与他人所作的多件簋铭中相应位置的“𠂔”(《陕集成》第1册第130—166页)以及商周金文中的“𠂔”^①写法不同。结合铭文来看,器铭“𠂔”左侧还明显有一“口”形,应是受其下“𠂔(右)”字的影响,先错书成“右”字,发现错误后将就此讹形,再改成“𠂔”。盖铭“𠂔”也是受其下“𠂔(右)”的影响,在写“又”形的过程中,及时发现了错误,因此没有写“口”形,然后在此写法上再改写成“𠂔”。如果静态地分析,此簋(《陕集成》0067)“特殊”的“𠂔”形实应看作误字“右”或“又”与正字“𠂔”的糅合形。

伯公父簋(《集成》04628、《铭图》05976,西周晚期)“黄”字,盖铭、器铭分别作“𠂔”“𠂔”,器铭之形系当时“黄”字的标准写法,盖铭之形上部与器铭之形上部虽有点近似但形体差别以及笔势差异也是明显的,且盖铭之形在西周金文中似仅此一见,它应该是受其左侧相邻的“𠂔(梁)”字影响,先误书了“井”形,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改成“黄”字。如果静态地分析,盖铭“黄”可看作误字“井”与正字“黄”的糅合字形。

湖北枣树林墓地 M190 出土了两件圆壶(M190:104、103),其中 M190:104 盖铭与器铭基本相同,只是前者标明作器者为𠂔𠂔,后者标明作器者为曾公𠂔。盖铭“用𠂔(享)𠂔𠂔孝”,“孝”前之字,发表者释作

①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卷八,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106—1115页。

“寿”^①,于字形、文例皆不合。器铭以及同出的曾公哱诸器铭文中与之相当的位置作“𠄎(以)”或“台(以)”。结合字形以及𠄎的异文或作“𠄎/台”来看,此形应是受其下“𠄎(孝)”字的影响而误书,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将其下部改成“台”字。

曾公哱钲钟(M190:262,第68页)“永用之”前的“𠄎”,曾公哱钲钟(M190:249,第69页)“吉金”前的“𠄎”,据同出器物上的铭文来看,前者与“𠄎/其”构成异文,后者与“其”构成异文,它们上部的写法应该是受同铭“自”字的影响,误书后将就讹形再添加“丌”形。

曾公哱钲钟(M190:32,第51页)“政”作“𠄎/𠄎”、曾公哱甬钟(M190:245,第60页)“政”作“𠄎”,所从“正”形头部与一般写法不同,与同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钲钟铭文中的“𠄎/𠄎”(M190:33,第54—55页)、甬钟铭文中的“𠄎”(M190:238,第64页)写法有别,它们很可能是受各自铭文中邻近一系列的“𠄎/𠄎(易)”“𠄎(易)”字影响,先误书作“易”字的头部,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改成“政”字。

上述都是周代金文的例子,那商代甲骨文中是否有类似现象呢?图1是杨熠缀合的《缀汇》947+《乙》5693+《乙补》4762图版:

《乙》5693



《缀汇》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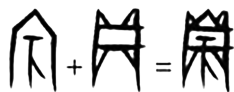
《乙补》4762

图1

①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19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年第1期,第40页。M190数钟皆出自该期发掘报告,以下随文括注页码。

其上有两条对贞卜辞,左侧那条是反贞辞,右侧那条是正贞辞,右侧“且(祖)乙”上方的“𣪠”,从辞例看,它相当于“鼎(贞)”字,但比同类卜辞的“鼎(贞)”多出一些笔画。杨熠对此解释说:

这组对贞辞位于首甲、中甲和前甲上部位置,刻写空间相对局促,卜辞从靠近千里路的位置起刻,下行之后转而向左右两边刻去,由于字大,如果不合理安排,很容易就会刻写不下或侵犯下方的卜兆。△(引者按:指“𣪠”,下文同)所在的是右侧的正贞辞,一般要先刻。大概最初先刻了“丙子卜”三字,然后右转向下一列刻贞人名“𠂔(宾)”,但刻完后发现如果继续以三字一列的布局刻下去,剩余的空间无法容纳接下来要刻的“鼎(贞)且(祖)乙𠂔(宾)于唐”^①六字,所以改在“卜”字下刻贞人名“𠂔(宾)”,使第一列容纳四个字,如此便可从容利用空间。接下来要刻的“鼎(贞)”字,就直接在原来“𠂔(宾)”字的位置刻写(也可能刻痕较深,刮削未净),而△正是“𠂔(宾)”和“鼎(贞)”两字形体重迭的产物,即:



所以单说△是“𠂔(宾)”或“鼎(贞)”都不准确,字编为△所列的字头应该取消。此类刻写现象值得留意,它生动体现了甲骨上刻写情况的层次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据此推知殷人的布局安排和补救措施等。^②

联系上述周代金文中将就误书、加以改造的现象,“𣪠”形极有可能也属于此类情况。即契刻者在本应刻“鼎(贞)”的位置受前一字“𠂔(宾)”的影响而误刻为“𠂔(宾)”,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同时利用“𠂔(宾)”所从“宀”旁的两侧竖笔改刻成“鼎(贞)”。如果静态地分析,“𣪠”形可看作是误字“𠂔”与正字“鼎”的糅合字形。

竹书文字中也有类似现象。《清华简(拾)·四告》简43“𣪠”,旧一般释作“係”。如果释“係”正确的话,其形值得注意。比较同篇的“𣪠”

①引者按,缀合后右边的卜辞为“丙子卜,𠂔(宾)𣪠(贞);且(祖)乙[𠂔(宾)于]唐”。

②杨熠:《甲骨缀合所见新字形信息及其考释》,黄德宽等主编:《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0—21页。

(简 36)、“𡗗” (简 43)、“𡗗” (简 44) 等“大”以及“𡗗” (简 36)、“𡗗”“𡗗”“𡗗” (简 33) 等字中的“人”形,可知该形左旁的“𡗗”与“大”只有一笔之差,该形左旁又可拆分出“𡗗”即“人”形,颇疑该形可能是从“人”的“𡗗(系)”与从“大”(大形的右手臂也可能与系跟人连接的部分共用)的“𡗗(系)”的糅合形。也可能底本本作“大”与“系”相连的“係”,因抄写者对从“大”的“係”不了解,在写“大”字的最后一笔时就将原来的笔画再写作当时常见的从侧写写法的“人”与“系”相连的“係”。

本节所举诸例,如果静态地看,不少都可以看作是误字与正字的糅合形。但如果动态地看,则是书写者发现书写错误后将就误书的字形,在其基础上再改成正确的字形^①。




从目前已发表资料看,商代金文有铸、刻两种书写方式,其中刻铭偶见。周代金文有铸、刻、墨书三种书写方式,其中墨书偶见。西周、春秋金文仍以铸铭为主,刻铭的数量较商代金文增多,但总量占比仍比较低。战国金文,刻铭则超越铸铭成为最主要的形式^②。上述金文误书类型几乎都出现在西周、春秋的铸铭中。从器类看,上述金文误书类型大都出现在能铸较多字数铭文的器类中,如簋、钟等,因为字数较多,书写出错的可能性随之增多,这也是很好理解的。

结语

通过本文所举诸例,可知周代书写铭文的人发现错误后一般不会将

①金文中这类资料的总量从目前搜集的情况看,并不多,其他古文字资料中的类似例子有待今后进一步搜集整理。“立中廷”的“廷”,颂簋(《集成》04332、《铭图》05390,西周晚期)作“𡗗”、颂簋(《集成》04333、《铭图》05391,西周晚期)作“𡗗”、颂簋(《集成》04339、《铭图》05397,西周晚期)作“𡗗”,系在“土”形下部横笔的下面添加了“八”形饰笔。颂盘(《铭图》14540,西周晚期)相应之字作“𡗗”,与以上诸形不类,它很可能是受同列“𡗗”字的影响,先误作“乎”字,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改成“廷”字。但由于颂盘铭文字形笨拙,多有错讹,疑是伪铭,故仅将该例附记于此处。

②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中西书局,2024年,第315页。

误书处理掉,而是忽略误书重新书写,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将就误书的字形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周代金文中确定的修改符号是非常稀见的。第一节所言研究者认为涉及修改符号的郑虢仲簋(《集成》04024、《铭图》04995,西周晚期)器铭以及郑虢仲簋(《集成》04026、《铭图》04997,西周晚期)铭文,其中表示“乙正”的修改符号,其实也不能完全排除它是忽略误书重新书写的例子,即比较“”,“”“”可能就是“又一”合文,只是“一”受“又”字中曲笔的影响也作曲笔而已。书写者发现误书作“一又”后忽略了“又”前的误书“一”,在“又”下重新书写了“一”字。

附录:本文引用甲骨金文著录文献简称全称对照(以简称音序排列)

《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年。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铭三》——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铭图》——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铭续》——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清华简(拾)》——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中西书局,2020年。

《陕集成》——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2016年。

《乙》——董作宾主编:《殷虚文字乙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1953年。

《乙补》——钟柏生主编:《殷虚文字乙编补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

《缀汇》——蔡哲茂:《甲骨缀合汇编(图版篇)》,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谢明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